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情感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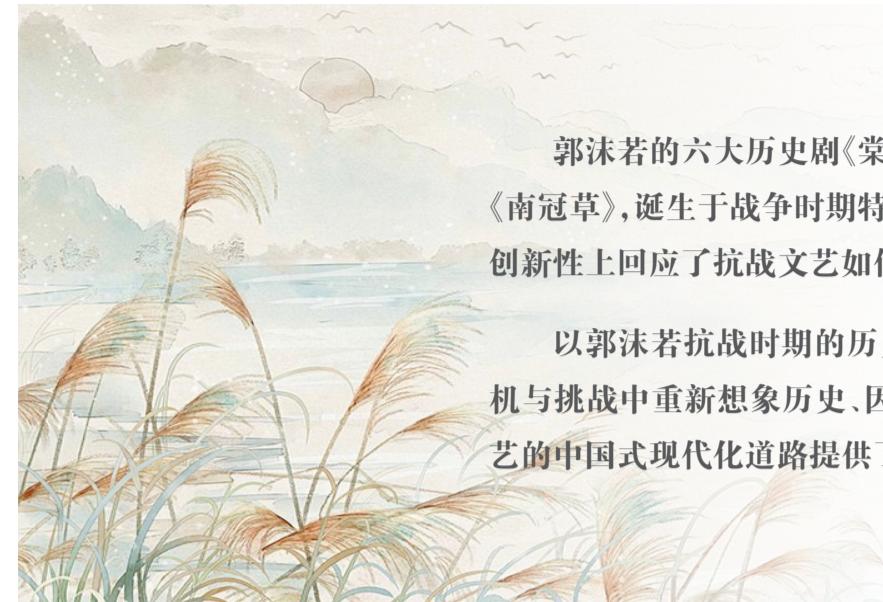
□王亭苏

抗战文艺的繁盛局面突出表现于抗战戏剧的辉煌，其中郭沫若以积极的实践探索成为抗战时期历史题材话剧创作的先锋。他的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诞生于战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从形式实验性和美学创新性上回应了抗战文艺如何动员民众的问题。和大多数左翼文人一样，相对于思想启蒙，郭沫若在抗战中更注重情感教育，通过历史的新讲述和英雄的重新发掘，其历史剧创作建立起有效的情感调节机制，并将激发出的民众情绪引向社会斗争层面。

皖南事变以后，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不断滋长，压抑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借古喻今的曲笔成为进步文艺家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郭沫若有四部剧均以战国时期为背景，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和“合纵”与“连横”相博弈的古战场相映照，六国如何应对“虎狼之秦”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也是千年后“危机时刻”的历史镜像。《虎符》里魏王“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暗射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屈原》里“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之语，更借屈原之口直接抒发民众渴望统一的共同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郭沫若仅在封闭的历史文本内部展开比附，相反，他奉行“失事求似”的原则，认为剧作家的任务在于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缚。史载“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隙”，故礼聘聂政刺杀侠累，到《棠棣之花》中，侠累被塑造为挑动“三家分晋”的国贼，韩哀侯则是屈服于秦国淫威的懦弱君主，官员间的个人矛盾上升为抵抗侵略或勾结外贼的地位分歧，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感选择也因此勾连起有关民族大义的政治选择；《屈原》则是借重文化资源以浇灌“现实的蟠桃”最为成功的范例，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介入与指导下，自由浪漫的人文气节被“转译”为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操。1942年4月观《屈原》剧后，黄炎培与郭沫若的唱和之诗中写道：“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历史故事在郭沫若笔下一再转化为叙述模式和感觉结构，以不断生成的姿态朝现实敞开。

“有效宣传”与“旧事新编”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文学是否为宣



郭沫若的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

《南冠草》，诞生于战争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从形式实验性和美学创新性上回应了抗战文艺如何动员民众的问题

以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为代表，抗战文艺如何在大时代的危机与挑战中重新想象历史、因应现实、构想未来，也为我们今天坚持文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与资源

传”的性质问题已无需赘言，“如何有效宣传”的技术问题才是文艺家所孜孜以求的。而对于以国统区和沦陷区为主要演出阵地的抗战历史剧来说，这一问题将具体化为如何使立场多元的观众产生集体共鸣：如何动员与前线战争保持一定距离的普通市民？为此，郭沫若不惮于从旧戏中汲取经验。一方面，善恶分明的人物脸谱与忠臣遭诬、义士捐躯等情节作为旧戏中的经典程式被重新启用，如屈原与南后、聂政与侠累、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人物对照组”中，是非黑白形成鲜明对照，一望即知，极大降低了普通市民观众的接受难度。人们站在上帝视角轻易辨清阴谋与真相的话语错位，哀叹士大夫“气节”的同时也激活了对当下历史正义的感受。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中戏剧“引人批评判断”同时蕴含着左翼知识分子独特的政治理想和历史哲学。同处1940年代的林同济、雷海宗等人曾提出“战国时代重演”的断语，被称为“战国策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文人曾与其就抗战中的世界历史与道德问题展开多重论辩。如果说“尚力”是“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推崇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与权变，那么“仁义”则是郭沫若通过历史剧创作立起的旗帜，将战国视为“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束缚的时代”和“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虎符》选取以仁爱宽厚著称的信陵君作为主人公，并借魏王宠妃如姬之口反复剖白对“喜欢我是把我当一件东西”这一

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称郭沫若的抗战历史剧为“情感教育剧”，因为其遵循的是一种相当直白且有效的“冲击—反应”模式，观者处于游动状态的自然情感拒绝被理性所捕捉，而凭借高强度的情感震颤沉浸其中。更进一步的，如郭沫若在创作论中所言：“悲剧的戏剧价值不在于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于具体地激发人们把悲愤情绪化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抗战历史剧内化了左翼文艺实践的传统，重视情感与政治的血肉联系，借助“流泪”“呼喊”“怒吼”等具身性的观剧经验，将被召唤的集体情感落实为社会动员的潜在能量。

除了躲避审查的现实要求与吸引普通市民的策略性考量，郭沫若抗战历史剧的“旧事新编”同时蕴含着左翼知识分子独特的政治理想和历史哲学。同处1940年代的林同济、雷海宗等人曾提出“战国时代重演”的断语，被称为“战国策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文人曾与其就抗战中的世界历史与道德问题展开多重论辩。如果说“尚力”是“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推崇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与权变，那么“仁义”则是郭沫若通过历史剧创作立起的旗帜，将战国视为“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束缚的时代”和“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虎符》选取以仁爱宽厚著称的信陵君作为主人公，并借魏王宠妃如姬之口反复剖白对“喜欢我是把我当一件东西”这一

‘良心’。”（罗雅琳：《塑造“女英雄”——抗战时期历史剧的美学与政治》）《棠棣之花》中，酒家女春姑为了向民众传扬聂政的英雄之举踏入险地，高呼“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什么！”《虎符》里的如姬先因信陵君“是维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而帮其窃符，后为阻断谣言自刎，死前对“暴戾者”的有力控诉几乎是屈原“雷电颂”的翻版。作为“家庭人”的古代女性与重大政治事件的联结，既以“情”的感性力量顺利引渡了伦理上的抽象原则，也召唤着能力有限但拥有基本良知的“平凡英雄”，即“知人皆可为诗人侠士，知自己和别人皆具有诗人侠士之心”。

聂嫈、春姑、婵娟、如姬等拥有强烈情感力量的“女英雄”之外，诸如酒家母、魏太妃一类女性形象同样值得重视。她们看上去似乎更接近封建道德对“贤妻良母”的想象，实则内蕴着抗战中大多数民众艰难的处境与隐忍的反抗。张炼红曾提出“细腻革命”的概念：被精英文化视作愚昧麻木之表现的“封建礼教”和“奴隶道德”中蕴藏着底层民众的情义与智慧，对这些内容的体察、包容与妥帖转化，能够激发出一种真正扎根于民间生活的“韧性抗争”精神。由此观之，在郭沫若笔下，酒家母能够出于对女儿的尊重与爱全其侠烈品格，而魏太妃则为了保护如姬认下了盗窃虎符的责任，她们虽无法与既有规范彻底割席，却承担着历史的重负，托举起抗争的火种，沉默的忍耐背后孕育着社会再发展的强力，而这正是抗战时期乃至更长时段的革命所要呼唤的广大人民。

历史故事在舞台搬演，而朝向远景的政治理想则依托情感的内在动力在社会空间传播。无论是旧事新编还是“人民”与“英雄”的辩证，本质都是在重造过去的历史与发扬反抗的精神，从而实现文艺家对现实具有能动性的介入，也呼唤观众在情感的涌动与更新中成长为新兴历史主体。抗战文艺的丰富性正在于此：既包括全民抗战所要求的即时性与动员性，也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艺术脉络之间展开融汇和创造，更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以新的实践道路，由此成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为代表，抗战文艺如何在大时代的危机与挑战中重新想象历史、因应现实、构想未来，也为我们今天坚持文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与资源。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读徐惠林散文集《家住太湖西复西》

收到徐惠林散文集《家住太湖西复西》的时候，书名给我指路不明的错觉，同时又给我寻家的急迫感。“东城是我的全部，童年和少年的时光。”《稼稿》中，作者笔下的东城，是屋前有水塘的三间土坯房，是插牙巴蒜的篱笆、打水漂的河岸、捡稻穗的晒场、是一个老师同时教不同年级学生的学校、是捉迷藏的大场房。这些碎片化的场景，显影出20世纪80年代乡村生活的真底片。当作者因转校逐渐远离家乡，东城就成了记忆的地标与生长的原点，而那些人和事却化作记忆行囊里的星星，聚成指路的灯塔。如果说东城是记忆的原点，那么藕塘便是乡愁的寄居地。《义父的藕塘》里，藕塘街是作者去义父家走礼必经的地方，也是让作者对一门被强建的亲戚关系不再排斥的外在理由。80年代的藕塘街像一幅褪色的老照片：在乡政府、图书室、供销社、剃头店构成的素色生活元素中，义父父母的关怀是温暖亮色所在。

散文的魅力在于不需要宏大的叙事，也不必追求深刻的哲理，只需真诚地记录那些“一言难尽的过往”，便能在读者心中激起久久不息的涟漪。正如作者笔下的家乡，虽已旧貌换新颜，但那些成长的记忆，永远鲜活如初。

（徐秀米）

“精彩地活过，比什么都重要”

——读《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有感

今年，作家、生活家、美食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蔡澜离世，翻开他的散文随笔集《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其真、其诚，还是那么亲切而自如。书中，蔡澜与我们谈读书、交友、饮食、茶道、旅行、情感、婚姻、家庭、花鸟等主题，涉及人生意义、生活情趣、情感培养、养生休闲等诸多内容。全书共分四个章节，书末附有描写一些名人与朋友的轶文，读者可以通过蔡澜的视角，了解不为人知的金庸、古龙、蔡志忠、成龙、村上春树、黑泽明等。全书所选篇目长短不拘，平实、诙谐构成了它的主基调。开篇，蔡澜就以“人生的意义，在于一天比一天活得快乐”为题，畅谈现代人该如何在忙碌的奔波之余，素雅地去面对生活的多姿和多彩。他凭着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言辞恳切地告诉大众“精彩地活过，比什么都重要”。现代人应该学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忙也好，苦也罢，少些计较，珍视走过的岁月，以坦荡的胸怀，迎接美好的明天。（刘小兵）

读者视点

■评论

在寻常的生活中寻找希望

——读项宏长篇小说《只道是寻常》

□董峰

项宏长篇小说《只道是寻常》共24个章节，讲述20世纪80年代末以苏阳为代表的几位高考落榜青年的打工经历与爱情生活故事，展现他们如何在生活的裂缝处寻找属于自己生命的光亮。

作品围绕4位青年的现实生活徐徐展开。作者以极强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对平凡人物进行客观的刻画，既描摹他们的日常琐碎以及伴有风霜的命运，也书写他们经历生活变迁后自我调节的耐心和勇气。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知识生活完全依靠个人坚持与偶然机遇，书店普通的工作岗位为苏阳这样的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让他们在物质匮乏中依然能够保持思想的丰盈，为自己开辟出一块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这种栖居不

依赖于任何外界优势，只要求几段安静阅读的晨昏，几个真诚思考的时刻。当苏阳在书店角落沉浸于阅读和写作时，他实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尽管物质条件有限，但精神却保持着飞翔的姿态。可以说，这是一篇能让当下读者畅读和畅想的作品。

苏阳、夏冰、罗明刚、胡园园等青年虽未经历大学校园的浪漫，没有未来精英身份的光环加持，他们的爱情只是诞生于集体宿舍的朝夕相处、工作上的默契配合，但这些情感关系因剥离了社会地位的考量而显得格外纯粹，也因生存压力的阴影而倍加脆弱。小说中苏阳的故事呈现出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特殊质地。夏冰喜欢有文化的苏阳，在写作方面与苏阳找到

情感共鸣。他们的爱情不依赖鲜花、礼物与餐厅的堆砌，而是在思想碰撞中确认彼此的存在价值。

作者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文字产生画面感和代入感。在苏阳和夏冰到荷塘边捞鱼的情节中，苏阳看着几条鱼在污泥中挣扎、窒息时，觉得自己就是污泥中的鱼，甚至有被拍打到岸边的小鱼和泥鳅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苏阳与夏冰此时的浪漫显露出脆弱的本质……这种细节的设定，暗合了苏阳的精神追求，让读者于此省思与共鸣。

小说结尾看似寻常，却暗含着不寻常之处，苏阳虽然升职了，但夏冰、罗明刚的死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和沉重打击。当苏阳最终选择到省城发展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励志的曙光，那些在书店里生长的希望，如同水泥缝

中挣扎的野草，既脆弱又坚韧，既微小又庄严，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生动的精神图谱，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作品给予读者这样的启示：真正的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谦卑与热爱。在科技、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或许都需要生活在边缘处寻找中心，在物质的限制中拓展精神的自由。书店的灯光虽然微弱，但足以照亮一个打工青年内心的宇宙；纸页虽然单薄，却能为漂泊的灵魂提供栖息的港湾。这或许就是小说《只道是寻常》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精神生活依然能够绽放出温暖而坚韧的光芒。

（作者系北京作协会员、北京石景山区作协监事长）

被微光照亮的世界

——读张梅中短篇小说集《土吃王》

□尹小华

张梅的中短篇小说集《土吃王》收录的10个中短篇小说，以太行山为背景，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古往今来和各式各样谋生活的人，同时也承载着五味杂陈的人生，像一根丝线，连接着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书中每个人物都携带着自己的成长史和精神漂泊史，怀着失望、茫然和希冀，盼望得到命运的关照与眷顾。在精彩的故事中，读者感受历史之变、道义之光和时代之音。

小说集作为多篇目的集合，考验着一个作家创作视野的开阔度和综合创作能力。《土吃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境遇，既包含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火硝烟，又展现改革开放和乡村建设的新图景，讴歌了劳动人民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勤劳勇敢、坚韧担当、大义凛然、淳朴友善的良好品质。每部作品既独立成篇又隐隐相连，小说与小说之间或在暗处勾连，或为人物的续写、故事的延展。

同名小说《土吃王》，讲述的是香脂

河一带的僧人、财主、进步学生和八路军官兵群策群力抗击日本鬼子的故事。他们在恩怨、得失、荣辱和生死面前，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团结一致，巧用连环计，消灭了驻扎在县城的日本小队和“二狗子”，香脂河重新碧波荡漾，人民迎来灿烂而美好的未来。《谁的钱》描绘了刘二和马文之间的真挚友情，也真实书写了这份深情带来的生活羁绊。作品中的人物充满善的本色，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抱有乐观的人生态度。

小说集《土吃王》描摹的多是生活在社会基层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小人物，字里行间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仿佛

能触摸到体温，听到他们的笑声。无论是视二胡为生命的王义，还是为了升迁绞尽脑汁的老十，或是为了命运到处奔波的刘笼，或是为了创业而苦心经营的白云，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追求，却常常被生活所伤。直到最后，从城里转了一圈又回乡的廖大妮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现在农村的政策好，许多同事选择了回乡创业，我也想试试。”在故事里的声声叹息中，作者的记述一点点擦亮了被潮湿的雨季和远逝的岁月模糊了的过往，读者不由自主地会产生共情。

小说始终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挖

掘一个个接地气的生动故事，将发现、感受和认识真实地表达出来，为读者呈现欣欣向荣的乡村蓝图。《创业的天》描写了几位复员军人积极运用国家政策进行创业的故事。牵头人杨锐是个木工，在成立家具公司前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后来他潜心调研市场，没日没夜地筛选数据，推演公司运营模式，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公司成立后，杨锐广招设计研发人员和复员战友，对木工坊进行扩建，向上级党委申请成立非公经济组织党支部，设立公益基金组织帮助他人。由于经营理念超前，诚实守信，公司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小说表现了奋斗成就人生、改变乡村面貌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重温着自己和老师、同学、邻居、亲人的深情交往，呈现出对故乡的真挚情怀和悠悠牵挂，倾诉一位太行山人对故乡的无限深情。

（作者系评论家）